

推出《考古中国》作品集,从考古角度发现、了解、认知中国 岳南:送你一把“洛阳铲”

□记者 马纯潇

关于洛阳铲

记者:岳老师,您在新书发布会上带了两把洛阳铲并由到会的考古学家吴九龙先生亲自表演示范,请问有何用意?

岳南:在普通读者和老百姓心目中,对洛阳铲作为一种工具在考古中扮演的角色很好奇,其神秘程度甚至超过了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因而总想亲自看一看,或者摸一摸,看个清楚,弄个明白。

记者:洛阳铲这玩意儿究竟是怎么来的?

岳南:洛阳铲的发明者原是河南洛阳一个叫李鸭子的“隔壁老李”,其目的就是用于盗墓。后来这个洛阳铲的神奇功能传了出去,并由中原传到了塞外,长江以北几乎所有的盗墓贼都用这个洛阳铲打洞探墓,且效果超出其他任何传统与现代工具。这个事儿也被考古研究人员所知,经过试验认为确实是田野考古的好帮手,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神器,于是把这个工具用到考古上,并在洛阳办了一个考古勘探班,这个勘探班使用的工具就是洛阳最著名的盗墓贼、“隔壁老李”发明的洛阳铲。自上世纪70年代起,洛阳铲就成为中国考古人员的专业工具了。1972年,中科院考古所的夏鼐副所长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带去的礼物就是一把号称中国神器或东方神器的洛阳铲。

记者:您把洛阳铲带到发布会会不会仅仅是因为对洛阳铲的喜爱吧?

岳南:当然不是。我这套《考古中国》除了11册书外,还有个赠品——洛阳铲模型,于是我就把洛阳铲拿到了发布会现场,让读者朋友们看一看。

另外,我还有更深层次的想法。洛阳铲是考古工作者的工具,而考古是发现中国、了解中国、认知中国的工具。我写《考古中国》这套书就是为了帮助读者从考古的角度发现中国、了解中国、认知中国,所以这套书也是我送给读者的“洛阳铲”。

《考古中国》写了三十多年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考古中国》这套书吧。

岳南:我这套书是由中南博集天卷策划,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计11册,是一部考古纪实文学作品集。主要写了明定陵、秦始皇陵兵马俑、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银雀山兵书竹简、广州南越王墓、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随州曾侯乙墓、清东陵、法门寺地宫等10个考古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过程,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始末。

记者:您这套书是何时开始动笔的?

岳南:这套书是1990年动笔的,当时我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五一节放假,与一朋友到北京昌平县明代十三陵特区旅游,感到那个地方的山川树木与一般的地方不同,令人惊奇。到了万历皇帝埋葬的定陵,也是十三陵唯一一座被考古人员打开的陵寝,一下子就被帝后的地下玄宫吸引了。就是这座深邃幽暗、神秘莫测的地下宫殿,使我产生了以纪实文学的方式,再现当年考古人员发现、发掘场面和命运的想法。于是,我辗转找到当年的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其昌先生采访,最终与她夫人杨仕共同完成了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作品《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的写作,并于1991年得以顺利出版。

记者:《风雪定陵》一炮打响后,您后边的作品有什么变化?

岳南:这部作品出版后在读者与普通百姓中反响不错,就决定继续写。自1991年

9月3日上午,岳南新作《考古中国》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著名作家岳南携《考古中国》这套11册皇皇巨著与读者见面。令人略感意外的是,他还带了两把洛阳铲。他这套《考古中国》系列到底都写了什么?历时三十年的写作过程都有哪些故事?他为什么把洛阳铲带到了发布会现场?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岳南(左二)在新书发布会上展示介绍洛阳铲。 受访者供图

起,又陆续撰写了《复活的军团》《西汉孤魂》《万世法门》《日暮皇陵》等10本考古纪实文学作品。

我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定陵的发掘过程中,由于时代和技术的局限,把明定陵地宫中发掘出的珍贵文物毁掉了大半,这是极其令人痛心的。知道了这些事情,看到了这样一个悲剧,心中就有感触,感触多了,就有了一种使命感,思维方式与关注点也开始改变。比如说此前的关注点着重在于发现、发掘过程的描述,也刻意追求故事性,感觉故事越传奇,越有悬念越好。但后来就发生变化了,即由情节是否离奇、好看,转移到对出土文物命运的关注上来。比如考古发掘过程中,是否有人为原因造成文物的破坏或损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后果或恶果?这就是我理解的使命感了。事实上,《风雪定陵》之后的采访与写作中,我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对类似事件有所披露,或者说揭露,并对造成文物损失的当事人进行了公开谴责,为此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还受到生命威胁。但我还是顶着压力把事实真相揭露出来了。至于这些人是谁,他们损害的文物是哪些,我记载得很清楚,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我就不多说了。

记者:你刚刚开始是一个遗址一个遗址地写,什么时候有了结成《考古中国》系列的想法?

岳南:这个想法在1996年就开始有了。除了由当时出版的五本书结成一个“中国考古探秘”丛书,还有十本或更多书结成系列的想法,记得当时的《中国文物报》采访我的稿子用的标题是《岳南想用考古成果建造一座文化长城》。我对记者说的主旨是:万里长城如果只建造了一里或十几里,根本没人注意,如果建造一千里,就会引起人类的兴趣,如果建造一万里,甚至十几万里,就了不得了,就成为世界人类一大奇迹了,你不关注都不行。

我的文学写作主要还是通过记述某个历史阶段的人与事,得与失,让后人从中得到一些教训,这个想法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主张是相通的。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一部《中国通史》或《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的环境和政治遭遇,加上失明,愿望未能实现,这是陈先生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我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学识与气魄,只是尽可能地向先生的思想和学术路上靠近,哪怕只靠近一步也好,这就是我写作的志向和目标。

记者:你的《考古中国》写了十个遗址

长博文办公室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北京人”下落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条报》的记者,还有日本东京、京都几个大学的教授、美国的十几位教授与略知线索者,甚至按照线索到北京日坛公园挖掘过(我找到了日本军医提供线索的另一棵大树,树上有剥皮痕迹,或埋在此树之下——此前中科院根据线索在另一棵树下挖过,落空),等等,结果还是没有找到。这是令我遗憾的事,也是不甘心的一件事。算起来,北京人头盖骨丢失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裴文中、贾兰坡等考古学家已经去世多年,但化石还是石沉大海,不知所终。借此机会,希望广大读者能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共同寻找北京人化石,使丢失的国宝尽快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以慰先辈们在天之灵。

保持独立性

记者: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会议上,您是唯一参会的非专业人士,这是不是标志着您的考古文学写作不但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请您谈谈您与考古学界的关系。

岳南: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项目,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结题。

我是在工程开始后不久参加并作为这个工程唯一的作家,被工程办公室允许全程记录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者,或称“御用作家”。工程进行中,各路专家为一个事件发生或一个年代的早晚争论、交锋十几年。就我的观察而言,以公心的攻伐为多,以私利的争论较少。至于这个工程的成败优劣,网上可查的议论多如牛毛,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工程进展中发生了什么,哪些人或言论对工程进展和所得数据发生重大影响,哪些人的言论虽未被采用但值得记录,哪些人或言论可以忽略不计等等。我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写作中只是如实记载发生过的事实而已。我的《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出版后,没有遭到多少人抨击甚至痛骂,多数学者为之称赞。拙著以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后,受到当地中国史研究者的尊重与肯定,这是我为之自豪和自慰的。

记者:《考古中国》系列共计划写多少本?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岳南:接下来会写安阳殷墟的发现、发掘过程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暂名为《青铜王朝——殷墟发现发掘记》,继之则是西域三十六国的追寻,包括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汉唐在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与作用等等。这一部分大约需十年才能完成,出版时我应当七十余岁矣。

记者:祝您早日完成心愿,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岳南:谢谢!



岳南《考古中国》系列作品,共11册。